

丰碑

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丰 碑

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
(第八辑)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中原突围的前前后后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办	(1)
关于签订《罗山协议》和《禹王城协议》的情况	中共罗山县县委党史办	(41)
坚持大别山 战斗到拂晓		
——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坚持革命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新县县委党史办	(52)
坚持在豫鄂边界	杨克 杨良新	(79)
战斗在大别山的鄂豫区党委		
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	杨良新 吴绪江	(122)
信阳地区剿匪、支前情况的调查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办	(125)
淮滨县剿匪情况的调查	中共淮滨县委党史办	(229)
固始县支援渡江作战情况的调查	中共固始县委党史办	(246)

- 息县剿匪、支前情况的调查中共息县县委党史办 (256)
- 商城县剿匪情况的调查中共商城县委党史办 (309)
- 商城县支前情况的调查中共商城县委党史办 (321)
- 稂明德同志谈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有关问题祝明干、杨良新整理 (369)
- 解放战争中的鄂豫军区第二分区熊作芳 (377)
- 刘邓首长的亲切接见刘名榜 (390)
- 在“中原突围”后的日子里邱进敏 (394)

中原突围的前前后后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办公室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无视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意愿提出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主张，蓄意发动反革命内战。但此时，他的部队多数还在中国的西南部。日本刚刚投降，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便急忙从峨嵋山上下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调兵遣将，向全国部署内战兵力，以图实现其返回南京，进军华东，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反革命计划。而中原解放军的五万雄师，虎踞中原的前哨——鄂豫边区，看守着蒋介石的出川大门，扼住了蒋介石向全国部署内战兵力的咽喉。因此，我中原解放军便成了蒋介石向全国进军的不可逾越的最大障碍，也首当其冲地成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一个作战目标。

正当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敲响的时候，蒋介石即调动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向我中原解放区扑来。一九四六年五月间，围攻中原我军的国民党军队即达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三十万之众，构筑碉堡六千余座，将我中原军区及所属三个军分区分割成“品”字形，将我中原解放军野战纵队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方圆仅二百华里的狭小地区，妄图在七月一日——我党生日发起总攻，聚而歼之。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我英雄的中原人

民解放军在实现了长达十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略坚持，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之后，在敌人发动总攻的前夕，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夜，一举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地进行了气壮山河的中原武装突围，按既定方针，转入外线作战，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游击根据地，继续牵制和毙伤大量敌人，为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原武装突围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是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伟大壮举。以中原突围为起点，拉开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为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进军。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鄂豫边区的形势

豫鄂边区（后称鄂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豫鄂边区地处中原前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境内，大别山、桐柏山雄峙其中；平汉铁路纵贯南北。由此向东，可达皖苏；西临川陕，屏障西南；南联湘贵，可趋两广；北抵冀鲁，绾毂中原。既是四通八达之地，也是四塞八抵之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便是全国有名的鄂豫皖苏区的中心。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我党的领导下，边区抗日根据地开始由豫南的竹沟、鄂中的汤池、鄂东的七里坪三个战略基点逐步扩大，直到抗战胜利，已发展成东起安徽的宿松、太湖和江西的彭泽，西至湖北的宜昌，北始河南的舞阳、叶县，南至幕阜山麓和洞庭湖畔，跨有鄂、豫、皖、

湘、赣五省交界的辽阔地区。①从这里诞生的新四军五师，逐步成长壮大为五万雄师。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里，边区既是抗日的敌后战场，又是抗日的前哨阵地。八年抗战，五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灵活机动地运用了战略战术，在边区人民的支持下，抗击了日寇三个师团八个独立旅及伪军五个军四个师，同时，还进行了反国民党军制造的频繁磨擦事件。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复杂斗争中，粉碎了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和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全国各战场起到了重大的战略配合作用。

日本投降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国内，已由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转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此时，“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②我党号召全国人民为争取“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③但是，蒋介石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妄图把中国变成依附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④企图凭借军事、经济、人力、物力的暂时优势，发动反革命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就形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搏斗的形势。针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和计划，我党提出了“针锋相

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号召人民对于“人民得到的权力，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⑤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们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给鄂豫皖边区负责人的指示中指出：“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区不可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八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又指示河南、湖北等战略区：“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⑦决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

不出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料，日本刚一投降，国民党军队即从四面八方向我鄂豫皖边解放区扑来。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第六战区第十集团军之六十六军经郝穴（江陵东南）、监利、沔阳向汉口开进；九十二军分两路向潜江、汉阳和武昌地区开进；第三十三集团军之五十九军由孔家湾（宜城以南）、流水沟（宜城东南）、马家集（钟祥东北）、洛阳店（随县以南）向应山、信阳地区开进；七十七军由钟祥附近向京山、安陆、随县地区开进；第二十六集团军为后方“绥靖”兵团，所辖之七十五军由宜昌以西之南津关向宜昌、十里铺（江陵以北）、沙洋（荆门东南）、天门、应城、汉川地区开进；国民党第五战区之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六十八军和五十五军，则向我豫中、豫西地区开进；第十战区之四十八军向我豫东地区出动。在国民党正规军向我

中原解放区开进的同时，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第十三、十四、十五、二十等游击纵队及鄂豫挺进军第一、三、四、六、七等游击纵队均向我解放区进犯。

为了谋求和平，避免内战，我主动撤出了鄂皖边等解放区。但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停止进犯，又将我鄂中、豫南、豫中解放区大部侵占，并抢占了武汉、信阳、驻马店、南阳、郑州等战略要地，控制了交通干线，企图凭借其军事优势，一举消灭中原我军。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洞察全局，深知中原地区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当天，党中央即电示新四军五师：“你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才不至临时张皇受挫折。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上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的内战危险是你们工作的出发点。”⑧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鉴于国民党大军压境，为了坚决保卫边区，边区党委积极准备反内战斗争。五师部队立即停止了受降工作，迅速进行了集结。一九四五年九月初，边区领导机关及五师主力，由平汉路东之大悟山，转移至京汉路西豫南之四望山地区。九月中旬，五师主力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旅九个团一万三千九百三十四人，全部集结于应山以北之浆溪店地区，组成两个野战纵队；加上师直一千六百八十三人，警卫团八百七十八人，共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五人。在组编部队的同时，进行了短期的军、政训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至此，五师主力由分散状态转为集中作战，由以游击战为主转为以运动战为主的新时期。

从反内战的全局出发，为了加强中原军区军事力量，大量牵制蒋军，党中央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命令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自湘粤赣边北返；九月十日命令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南下；十月，命令王定烈等同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水东八团南下。上述部队于十月二十四日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于桐柏祁仪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五师为主体，组建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兼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副主任。野战部队组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兼），辖一、二、三，共三个旅；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政委任质斌，辖十三、十四、十五和三五九旅，共四个旅。中原军区下辖河南（以桐柏山为中心）、鄂东（以大悟山为中心）、江汉（以大洪山为中心）三个军区。野战部队和军区部队共六万人。在三大主力会师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局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应山县以北之浆溪店正式成立，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五人为中原局常委，郑位三代理书记。从此，中原地区的党、政、军、民在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内战的斗争。⑨

此时，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但是，国民党毫无和平诚意，利用和谈作掩护积极向解放区进攻。《双十协定》公布后，蒋介石即颁发了“剿匪密令”。在鄂豫边区，国民党第五、第六两战区部队继续向我进攻，其五十五军堵截我河南军区部队南下，六十九军一部配合国民党鄂豫挺进军第一、三、六、七等四个游击纵队，自高

城、天河口、厉山（均在随县北）向我信（阳）桐（柏）地区进攻；平汉路东敌之三十四军之三十师向遂平以东地区出动，配合豫南挺进军十四、十五、二十等三个游击纵队向我淮河以南地区合击；敌之五十军、七十七军分布于平汉路信阳至汉口段，伺机向我进攻。狂妄地叫嚷要在十一月内“肃清”中原我军。

在此情况下，我中原解放军忍无可忍，让无可让，遂发起桐柏山自卫反击战。经过三次大的战斗，相继解放了桐柏、枣阳、新野、唐河四座县城。党中央来电嘉勉中原部队：“中原部队会师后，应更加团结一致，为创造中原地区的新局面，配合华北、华东、东北的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制止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⑩

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加之，我三路部队刚会师不久，互相之间的配合不够，致使桐柏战役的三个阶段均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敌未受到严重打击，于是更加猖狂。十二月中旬，国民党第五、六战区纠集十一个军二十四个师，以及八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疯狂地向桐柏山地区之我军主力扑来。此时，我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更加困难，已处于不利形势。为了避敌锋芒，夺取主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除留河南、江汉两军区部队在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外，中原部队主力向平汉路东挺进，拟至安徽省五河一带与新四军主力会合。东进时，部队分南北两路前进。第一纵队为北路部队，由桐柏驻地出发，十二月二十一日进至明港（信阳以北）以西之祝林集地区，稍事休整后，二十五日，在信阳以北越过平汉路，并于行进间，攻克汝南埠（正阳以北）。二十八日，第三旅解放息县县城，歼灭敌挺进军千余

人。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第一旅攻克光山县城，歼敌四百余人。中原局、中原军区率第二纵队为南路部队，由唐河以南驻地出发，从王家店（孝感北）越过平汉路。一月八日，两路部队会合于光山、经扶（新县）以西地区。

在我东进时，蒋军又竭力尾追，并增调兵力向我定远店、宣化店地区进攻，当即被我歼灭两个团。

一月十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达了停战命令，规定自一月十三日零点起就地停战。停战命令下达后，中原局、中原军区根据停战命令将所率之主力部队，集结于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光山、经扶和礼山一带待命。所属之河南、鄂东、江汉三个军区之部队也同时在原地待命。一月十六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和行署机关移驻宣化店。其第一纵队驻杨家庙、砖桥、豆腐店及浚陂河等光山东南地区；第二纵队驻定远店、周党畈、朱堂店、宣化店附近及文殊寺等罗山以南、经扶西北地区；鄂东军区部队驻黄陂站、禹王城、华家河、四姑墩等黄安、礼山间地区；江汉军区部队驻杨家集、客店坡等京山以北及杨家棚、古城畈等安陆西北地区；河南军区部队驻涩港店、王家店等信阳以南及武胜关西北之大庙畈地区。与此同时，蒋介石围攻中原我军的部队也与日俱增。中原局势，极端复杂。

从东进的两路主力一月八日在光山会师，到停战令生效的一月十三日，共五天时间。当时，“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五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⑪但是，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从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五

师没有继续向东走，而是在中原这块战略要地上坚持下来，决心以最大的牺牲，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牵制敌人的任务。

从此，我中原部队在豫南、鄂东地区渡过了将近半年的艰苦卓绝的不平凡的岁月。

二、中原解放军争取和平、制止内战的斗争——光荣地完成战略坚持任务

从停战令下达，我中原解放军集结于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豫东南、鄂东地区待命，到六月底突围的五个多月时间里，中原我军一直处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之中；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日日闹磨擦，天天有战斗，打打谈谈，谈谈打打，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达到了牵制敌人，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间之目的。我们谓这段时间为中原解放军战略坚持阶段。

停战令下达后的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停战期间对顽斗争方针给中原局的指示中指出：由于我们的对手是有经验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动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消灭我们的企图的。因此，我们的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独立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基础上。在停战令后复杂斗争形势中，一方面要进行合法斗争，开展和平民主的政治攻势，揭穿对方的内战阴谋；一方面又要提高警惕，坚持自卫原则，防止与打击对方的突然袭击，当其进攻时，应坚决消灭其一、二路。抗日战争时期又斗争又团结的原则仍可运用。^⑫根据中央指示，中原我军除驻守原地严守停战命令外，并立即在部队内和群众中广泛宣

传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我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动员解放区党政军民共同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

而蒋介石却以公开的停战令作为缓兵之计，用秘密的作战令加紧内战部署。停战令刚一下达，蒋介石即令国民党军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对共军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共军”。^⑯并先后将一八五师、一九九师调到平汉路东之信阳、罗山一带；一〇四师、一二二师、一二四师调至潢川、光山一带；一二五师、一二七师调至罗山、光山一带；又将原驻赣西北修水及鄂南通城一带之七十二军新十三师和新十五师全部调至长江以北黄陂、黄安地区；第十军二十师调至大洪山（鄂中）地区，初步形成了对我军的包围态势。在停战令下达的第二天——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我息县县城。在停战令生效的第二天——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四十一军之一〇四师、一二二师及四十七军之一二五师、一二七师等部又攻占我光山县城。接着，敌七十二军及豫南第一游击纵队等部又相继侵占了信阳、桐柏间的三道河、茶山等地区。与此同时，我击退了敌七十二军一个团向浒湾（经扶北）的进攻。据不完全统计，从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敌向我进攻七十七次，侵占我主力周围较大村镇四十六处。

鉴于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之规模不断扩大，我主力部队所在地区逐步缩小，中原地区的形势日趋恶化。经我提出严重抗议，北平军事调处特派第九执行小组前来汉口制止中原战争。第九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葛雷夫士上校、国民党代表邓为仁少将、我方代表薛子正上校，还有美国驻汉总领事施

德波、美国驻汉新闻处付施德及武汉各报记者，于一月二十一日到达信阳，二十二日从信阳出发，经罗山城和定远店，到达宣化店，一路上分别同平汉线上的国民党之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驻罗山之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进行“磋商”，同我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将军进行了商谈。二十三日，王震同志随同第九执行小组一行转到罗山县城，签订了《罗山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军队……均停止于现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蒋方并就我军在其所驻在地区之间运输给养之安全问题作出了“绝不阻挠干涉”之保证。^⑪

在罗山谈判中，我方首席代表王震将军对国民党军在停战令生效后攻占我光山县城提出严厉责问，并要求国民党军一二二师、一二七师迅速撤出光山县城，退到一月十三日夜零点以前的原驻地点。国民党代表宋瑞珂卑鄙无耻地硬说其攻占光山县城的时间是一月十三日的上午，而不是十四日；是在停战令生效之前，而不是在生效之后。同时，他还秘密通知其进攻光山的部队和有关指挥的各级司令部，把所有攻占光山县城的命令、报告、通报及有关文件，重新伪造，把时间一律提前一天，以备“三人小组”调阅。此外，还从一二二师、一二七师挑选几百名干部、士兵，乔装当地各色人等，布置在城关各要道口，以备“三人小组”莅临查访时冒充当地居民出来答话。这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蒋方方提请“三人小组”前往光山调查。我方代表看穿了国民党的鬼把戏，认为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光山县城，人民的公正舆论不可能出现；同时，事实俱在，实无调查之必要，因此，严厉拒绝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前往光山调查的意见。^⑫

《罗山协议》签订后，国民党并未停止对我中原解放军集结地的进攻，除了继续对我主力部队“扩申”，紧缩我驻区范围外，并声称我留在河南、鄂东、江汉三军区的部队均系“匪匪”，要定期“肃清”。随之，将其进攻的重点放在我以上三个军区，妄图首先摧毁我三个军区，再“围歼”中原我军主力部队。我不带武器之运输部队亦经常受其多方刁难，甚至被扣押。

鉴于上述情况，我一方面运用各种形式揭露蒋方侵犯停战命令和《罗山协议》的种种阴谋，一方面要求汉口执行小组前来调处。一月二十九日，驻汉第九执行小组由汉口乘车来我中原军区，与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将军会见于禹王城。后经多方协商，达成一临时性协议，即《禹王城协议》。《协议》重申了《罗山协议》的精神，强调了执行《罗山协议》之必要。^⑯

为了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元月底，中原军区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李先念司令员前往武汉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共同协商同国民党谈判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同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副主任郭忏谈判设立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等问题。李司令员于二月四日到达武汉。二月七日开始谈判。经过几天的谈判桌上的激烈斗争，迫使美蒋两方不得不就周恩来提出的（一）中原地区国共两方部队在各自位置停止敌对行动，（二）组成负责处理中原地区问题的武汉执行小组，（三）中原军区正式在武汉设立办事处机构，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达成协议。于是，武汉执行小组即三十二小组组成，美国上校福尔德、国民党少将邓为仁、我方代表任士舜以及军调处我方代表薛子正等人为三十二小组

成员，调处中原战事问题。同时，决定郑绍文为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主任。^⑯

以消灭中原我军为其最终目的的国民党军队，对执行上述协议毫无诚意。其在不断对我进行军事蚕食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敌不仅在我周围形成一包围圈，还占领了各大、中城市，切断了交通要道。我中原六万大军的给养苦无来源。不但粮食极端缺乏，有时甚至连饮水、烧柴问题都难以解决。至于必要的医疗用品，更是无从谈起。指战员们一连几个月过着“囊中有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的艰苦生活。在这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我中原部队广大指战员不怕苦，不畏难，不屈不挠，只要能拖住敌人，再苦再难也毫无怨言。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机关、部队开展了生产自救，小分队分散到各地，就地筹粮，基本群众尽其所有的一升一碗的把粮食拿出来；而有钱有粮的地主老财，打借条也不借给。有时也夺取敌人粮食来补充自己；有时只有挖野菜、刮树皮来充饥。外出之运输部队仍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无理刁难和阻挠。

鉴于上述情况，我再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移往安徽五河地区就食问题及非武装人员的运输安全问题。根据我之要求，军调处下达和字第四号命令，令第九执行小组赴宣化店和我中原军区首长会商有关事宜。第九执行小组于二月二十日到达宣化店，旋即会见中原军区司令李先念将军，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两天的会谈，这就是“宣化店会谈”。二十三日中午会谈结束。第九执行小组在中原军区礼堂发表了会谈公报。

公报全文如下：